



被掏空的灵魂

□张怡微

我猜想，韩国作家赵南柱应该算是当代社会话题小说家的代表。很难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流行小说流派，但提到赵南柱的代表作、2017年的短篇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读者就能明白这一类短故事的影响力，至少在中国，这本书曾引发过激烈讨论。确切到具体出生时间和主人公名字的书名，更符合手机时代社交媒体传播的条件。标题看似是真，事实却立足于虚构小说，是一类仿拟非虚构真人故事的虚构作品，旨在命名一类人的生存危机。社会新闻的传播价值是这类故事追求的目标，文学性反而位列其次，赵南柱1978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她的专业背景似乎解释了其作品生产的立足之境，那就是普通人，确切说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困境。她不会那么关注个别、关注能冲破束缚的英雄传奇，她需要通过凝聚集体微弱的呻吟，形成足够大的声量，反思被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压迫艰难生活的小夫妻、小家庭和小生活。

2023年被引进中国的《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也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作。故事说是韩国人与房子，更具体的是，不涨反跌的房子和不幸购买它的人，新书封底上写着“我们是不是也生活在徐英洞呢”，焦虑感由此召唤扑面而来，让人想到一些热门短视频中刷到过的眼睛里不再有光的新婚购房者。但读完书后发现，“总觉得自己家的房子被低估了”，也可能算是赵南柱作家所捕捉到的当代都会青年能够互相传染的典型焦虑症。《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由网络发帖开篇，进入到故事主线。结婚六年的夫妻世勋和裕贞提到了前年搬到徐英洞的邻居勇根，勇根因对自家房产不涨价这件事十分恼火，鼓动世勋所在的足球晨练队队员一起举报房产中介。世勋对不涨的房价也很头疼，因为他失业了，如今生活全靠裕贞一人的收入。买下这栋不涨价的房子，莫名其妙成为了世勋如今婚姻生活的基石，不然他可能会因为自己没有收入和房子而更加自卑。裕贞的压力同样很大，父亲还在她家对面小区当门卫，母亲向她借钱补贴哥哥，裕贞曾如此渴望搬出原生家庭，最后因婚姻而如愿，算得上高嫁。她幸福吗？丈夫明明失业，她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却依然会因为父亲职位只是门卫而不敢跟丈夫启齿。可见房子在这场婚姻中的权重，是不平等的来源。直到有一天，父亲所管辖的楼宇漏水，所在物业为了省钱而不愿请更多维修工，父亲浑身恶臭想来对面女儿家洗个澡……故事迎来了裕真最恐惧的一刻。这段“警告侠”的故事写得如此心酸，将卑微的父亲、被生活重压的女儿及她并不自信的婚姻生活刻画得狼藉。父亲终于因在社区到处贴“警告”履行职责被居民辱骂殴打后解聘，站在永不涨价的徐英洞最贵小区的最佳楼层上的裕真知道之后泪如雨下。

徐英洞不只有年轻夫妻，还有年轻父母，他们对学区的焦虑，会让我想到许多年前有一部金喜爱演员出演的剧集《妻子的资格》。《妻子的资格》讲述了一个被课外辅导热潮和子女教育问题逼出婚姻危机的故事，尤其是剧中关于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又为什么要沉浸在如此窒息的社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传播痛苦。其背后存在性的焦虑，反而是更接近哲学沉思的。赵南柱写到徐英洞的妈妈门，几乎复刻了《妻子的资格》中江南妈妈们的群像：“外语高中毕业的孩子们妈妈、名门大学毕业的孩子们妈妈、海归派孩子们妈妈、在三星上班的孩子们妈妈，这样的妈妈很多的，不过，以前在哪里做什么重要吗？现在都一样是孩子们的妈妈。”然而她们终究还是比不上江南妈妈们的精英感，就连仿制都很容易被拆穿。住在徐英洞的勇根的妻子银珠，有时会看着胆小的女儿流泪：“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就为这才离职的吗？”她是如此重视女儿的社会性教育，但她又是如此不自信于自己产后的社会性退化，直至她发现女儿同学的妈妈是整容后的中学同学，一切压力都消散了。这种消散感成就了人之为人、精英妈妈之为精英的荒谬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更像是如今体积不大但矛盾集中的韩剧。徐英洞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阶级、社群和某种生存境遇。在这个小世界里，重男轻女、不平等的婚姻、妈妈圈、补课班的尔虞我诈、对上层社会规范的拙劣效仿，其实都暗喻着精神性的孱弱。女性依然是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她们是那么传统、清醒且不快乐，表面上和房子有关，其实则是灵魂的空洞。她们在男性建构的社会秩序中苟且偷生，根本无力冲破和重新找回自己的主体性，也不可能如“儿子”“丈夫”“哥哥”一般获得无偿的援助得以不劳而获就能看起来像个人。正如小说结尾所嘲讽的：“拼拼凑凑就能买到房子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灵魂呢？我连灵魂都是空洞的呀！雅啖笑了，但实际上，那并不可笑。”



善恶比成败更重要

□陆远

故事发生在太平洋深处的一座荒岛上。一架飞机坠毁了，一群幸运的男孩活了下来，大的十二三岁，小的不过六七岁。更幸运的是，他们发现正身处一个没有大人管束，完全自由自在的快活境地。然而，海滩上和丛林里无拘无束的野营生活很快失去了吸引力，随着夜幕一次次降临，对莫须有的野兽的恐惧越来越紧地缠绕在孩子们心头。分歧出现了：以拉尔夫为首的几个人，试图建立一套民主合作的规则；以杰克为首的另一帮，却对猎捕野兽充满原始的热情。事实证明，唯一的野兽隐藏在少年们内心深处。在失去法律和道德约束的绝境中，天性中固有的邪恶、猜忌与冲动逐渐膨胀，少年们陷入相互厮杀之中。最终，两个孩子在同伴们的棍棒与乱石下死于非命，而他们恰恰是其中最具有反思精神的两个——其中一个曾悲伤地问自己：“我们是人类，还是动物？抑或是野蛮人？”另一个的话更加一针见血：“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

当然，这个故事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它是一位英国南部小城索尔兹伯里（它以神秘的巨石阵闻名世界）一名教师虚构出来的。1951年，威廉·戈尔丁问他的妻子，写一个关于一群少年流落荒岛的故事来描述他们“真实的行为”，这个主意怎么样？

然后，《蝇王》问世了。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和难堪，在初版30年之后，《蝇王》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迄今为止，这本小说已再版至少40次，被翻译成超过30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超过1000万册。

对于英国读者来说，《蝇王》或许有特殊的意义——自从1953年温斯顿·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英国人翘首盼望这座桂冠再度降临已整整30年。事实上，在丘吉尔《二战回忆录》获奖的翌年，《蝇王》就已经出版，然后这两部作品的旨趣却大异其趣。丘吉尔因为在二战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而获奖，同样从战场归来的戈尔丁（他曾在英国海军服役5年，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想就战争中的人类暴行发问：奥斯维辛只是一个异常的特例吗？抑或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纳粹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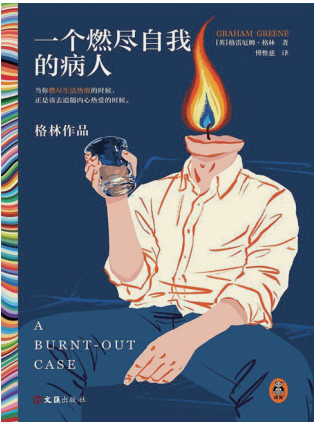
在《蝇王》中，戈尔丁暗示，答案是后者，他试图通过这本小册子刻画人类内心深处最阴暗的一面。在给出版商的信中，作家写道：“即使我们出生时一身清白，天性也会迫使自己变得满身污臭。”在他看来，“人类天生会制造邪恶，就像蜜蜂天生会酿造蜂蜜一样”。戈尔丁最终借此一举成名，并成功地再一次引发了人们有关人性善恶问题的广泛思考和争论。

18、19世纪，英国一直是盛产“荒岛求生”题材的文学大国，从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到巴兰坦的《珊瑚岛》，再到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故事的基调总是积极向上，充满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其中的少年主人公也多以团结友爱、勇敢机智、抗强扶弱的面貌出现，每每以维多利亚的乐观进取精神竭力展现善高于恶，善战胜恶的基本价值观。戈尔丁颠覆了这一切，在他的笔下，涉世未深本应“天真无邪”的少年同样无法遏制内心恶的滋长，这只能说明是人类本身出了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类出了毛病，不是某个例外的人，而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相信人类的情况是一种道德病态的产物”。在戈尔丁之前，没有作家敢于在一本以少儿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中尝试用如此强烈而直白的现实主义笔法展示人性的“阴暗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戈尔丁是一位文学家（单以文学性而言，《蝇王》实在乏善可陈），毋宁说是一位寓言家，他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人类不能对“天性之恶”予以警告，不但荒岛不会变成乐园（像珊瑚岛那样），即便也已存在的人间乐园也会沦为荒岛。有评论家说，《蝇王》标志着一个“文化上的突变”，也多少体现了战后一代内心的失望、沮丧和虚无。

不过，进入21世纪，戈尔丁带来的沉重而灰暗的话题，又得到了一些明亮而温暖的回应。出于对戈尔丁“人性本恶”观点的怀疑，荷兰记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不满足基于一个虚构故事的结论，记着寻找现实版“蝇王的故事”。于是，一个发生在1965年的真实故事逐渐为人所知。6个渴望冒险的男孩被困汤加南部荒无人烟的阿塔岛长达15个月，最终他们凭借分工合作和彼此扶持，等来了偶然经过的渔船。真实世界的荒岛求生是一个关于友谊和忠诚的故事，它让我们明白，如果能够相互依靠，人们可以变得多么强大。

读到这里，想必读者都会明白，人性究竟是善良、积极还是邪恶、消沉，每个人的答案，只能到自己内心去寻觅。

删人快语



燃尽与重生

□蒯乐昊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揶揄村上春树总是“陪跑”的时候，别忘了格雷厄姆·格林，一生曾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了26次！但是，没有获奖！

倒是也有一些其他奖项给了他一些慰藉，比如耶路撒冷文学奖，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大师奖，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功绩勋章。更别说还有一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把他视为精神偶像和导师，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福克纳、奈保尔、库切、威廉·戈尔丁、马里奥·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更是格雷厄姆·格林的忠实读者，他说，“虽然他们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我，但也是间接授予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的书，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里写过，有一次马尔克斯和格林一起乘飞机，他问格林，诺贝尔文学奖老是不给他这个奖，这事儿他自己怎么看？格林秒答：“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一生的经历颇为传奇，他曾经在中东、古巴、非洲、越南、墨西哥等地游历，出入战乱之地，他曾在英国军情六处任职，从事间谍工作，长期复杂、高压的生活让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关注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救赎。道德、使命，宗教，人究竟为何而活，这些命题贯穿了他的创作，被认为20世纪人类内心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

格林写过不少侦探和悬念小说，也有大量文学性极强的严肃作品，他有本事把通俗读物和严肃文学冶于一炉，直到读者完全无法辨认两者的分野。《一个燃尽自我的病人》便是他的严肃小说代表作之一。但悬念依然伴随始终，在刚果一个偏远破败的麻风病院，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人，他停留此处，完全是因为他搭乘的船只不再向前走了，他的航行没有目的地，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就像那种被风吹走的种子一样，风在哪里停下，他便在哪里落脚。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他要求在麻风病院谋一份工，随便找点什么事干，学习电疗，或者给患者洗绷带，甚至对自己可能被传染上麻风病也漠不关心，医生不由得怀疑他是身上背着通缉官司的罪犯。但在这世界的尽头，这无关紧要，即便是杀人犯，医生也会收留的，“你可以告诉我，不用怕——告诉这里的任何人都不用怕。你会发现，麻风医院是同外籍雇佣兵团一样安全的。”

这个名叫“奎里”的人，最终还是被当地殖民白人们认出来了，他们发现，这张脸在《时代周报》上出现过，他是“那个奎里”，一个蜚声世界的建筑大师，设计过好几座了不起的大教堂。

作为著名建筑师，他得了一种疾病，燃尽了生活激情的病，在他看来，这种病跟麻风病也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种精神上的麻风。他不但对自己曾经热爱的职业失去的兴趣，对家庭和女人失去了兴趣，对宗教也失去了兴趣，曾经他建起的大教堂，在他内心早已坍塌，他也多年不再去望弥撒了。麻风医院听过了他的履历，便提出要让他帮忙建一所新的医院，并派给他一个仆人，一个被治愈了的麻风病人，但是病症已经让他失去了手指和脚趾，这使他工作起来格外笨拙。

在前往麻风医院的轮船客舱里，奎里曾在旅客日记里写下了一句：我感到不舒适，所以我是存在的。这显然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变体；我痛故我在。

仿佛隐喻一般，在麻风病院，病人被疼痛折磨得彻夜哀嚎，病菌无情地攻击他们的肢体，使之腐烂，然后不得不切除，但当病程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疼痛便消失了。在反思中，奎里道出了现代人的集体症候：自我表达。自我如一根蜡烛，它越是旺盛，就燃烧得越快，最后消耗殆尽，剩下一堆灰末，他虽体格健全，四肢俱在，但很不幸，他就是那个已燃尽的病人。

格林本人患有躁郁症，与家庭生活格格不入，他曾是天主教徒，但后来不再去教会。在庸达和喀麦隆地区，他确实走访过不少麻风病治疗区，这些都成为他写作的来源。“我猜……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但要说刺探，《一个燃尽自我的病人》里所包含的刺探，并非指向外部世界，而是深深指向自己。非洲和麻风病人，不过是合适的舞台布景而已。